

行动科学经典译丛

[美] 唐纳德·A. 舍恩 / 主编

夏林清 / 译

反映回观

教育与咨询实践的案例研究

The Reflective Turn

Donald A. Schön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行动科学经典译丛

[美] 唐纳德·A.舍恩 / 主编

夏林清 / 译

反映回观

教育与咨询实践的案例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周益群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张 珍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映回观：教育与咨询实践的案例研究 / (美) 舍恩主编；夏林清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1
书名原文：The Reflective Turn
ISBN 978 - 7 - 5041 - 4616 -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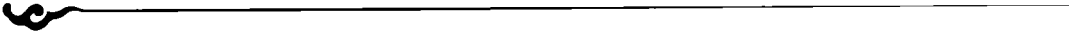
I. 反… II. ①舍…②夏… III. 教育心理学：咨询心理学—案例—研究 IV. G4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6799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 - 2008 - 3499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21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7.25	印 数	1 - 3 000 册
字 数	365 千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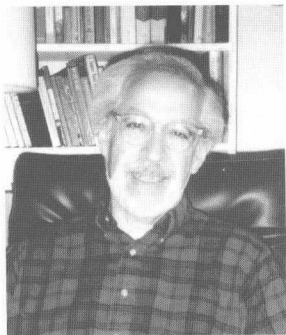


FANYING HUIGUAN

JIAOYU YU ZIXUN SHIJIAN DE ANLI YANJIU



三 编 简 介



唐纳德·A.舍恩教授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城市研究与教育的福特教授，并曾担任城市研究与规划系的主任。舍恩1951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哲学学士学位，并分别于1952年和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还曾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单簧管，并获得了法国巴黎国家艺术学院的证书。

作为学者和咨询顾问，舍恩的研究领域是组织学习和专业效能。在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之前，他创建了社会和技术革新组织（OSTI），并担任这个非营利组织的主席7年之久。他还在政府和私营企业的很多部门担任管理和咨询职务。

1970年，舍恩应邀请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里思讲座（*Reith Lecture*）。1984年，他在加拿大皇后大学担任客座讲师，并且成为英国皇家建筑学院的荣誉成员。舍恩其他的著作包括《反映的实践者》（*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1983）和《组织学习：来自行动视角的理论》（*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 Theory of Action Perspective*, 1978，与阿吉里斯合著）。舍恩在很多专业组织中担任职务，2000年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以及国家社会技术系统研究委员会的成员。

导读/在典范转向中回观实践

夏林清

说唐纳德·A. 舍恩 (Donald A. Schön) 的反映实践在方法论典范转向风潮中独领风骚并不为过!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 舍恩与克里斯·阿吉里斯 (Chris Argyris) 合作完成《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 一书后, 两人又分别书写了具不同特色之介入理论与方法的专著——阿吉里斯的《行动科学》(*Action Science*) 及相关著作多本, 舍恩的《反映的实践者》(*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培养反映的实践者》(*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及本书《反映回观》(*The Reflective Turn*)。1996 年, 两人则再度修订完成了《组织学习 II》(*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I*) 一书。1998 年舍恩去世, 享年 67 岁, 阿吉里斯则以 80 多岁高龄仍精神抖擞地工作着。

有缘跟随舍恩与阿吉里斯的路径学习是这一生很大的福分。其中舍恩也是我学习时的导师! 2002 年夏天我在戴安娜·史密斯 (Diana Smith, 她是阿吉里斯与舍恩的学生, 亦为《行动科学》一书作者) 家的后院中与南希 (Nancy, 舍恩的妻子) 见面, 通过她取得了此书的翻译版权, 也进一步认识了舍恩的雕刻艺术家妻子。南希说直到舍恩去世前, 阿吉里斯

几乎是每周必到舍恩家与他畅聊，两人间亲密的友谊无人能及！舍恩确实有独特的能力，能与个性鲜明、行事独特的学者建立长期的情谊，并发展出长期的智性协作。除了阿吉里斯之外，麻省理工学院专长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的马丁·赖因（Martin Rein）亦为一例。

舍恩与阿吉里斯都是身体力行自己理论的人，1990—1991 年舍恩带领我完成论文的那一年中，每每在办公室等待与他进行讨论时，都遇见他正在和一群系所秘书开会，进行反映学习的苦差事（认真进行反映学习是辛苦面对自己与别人，因而每个人走出团体时的脸色可不见得愉悦轻松）！他能邀集《反映回观》一书中诸多作者共享盛举，亦无非是其毕生功力展现的一个实例而已！

科技理性模式的转向可能

让我们先由中国台湾 21 世纪初的这个时空来看这本书！台湾教育、社工与心理专业所依靠之认识论典范，在过去 10 年中才逐渐地由一枝独大的实证典范，转变成诠释现象与批判解放典范并存的多元空间。近几年来，这些专业领域内的许多工作者，已由零星个别的学习渐渐地在通过抗拒知识权力与行政威权对实践经验扁平曲解的过程中，一小群一小群地觉醒了，他们进而力图发展出能发现、表达与沟通实践知识的行动。

在中国台湾，对行动研究、组织学习、行动科学与反思思考多多少少有些了解的专业，包括了教育、社会工作、心理、企业管理与都市规划。近 10 年来，因教育改革而由各层教育主管单位加诸于中小学教师身上，要求教师改变的行政要求，是“行动研究”方法快速传播的主要作用力量。虽然这一种由上而下要求教师“做研究”以“自动自发学习新知与改变教学模式”的行政推动逻辑，从根本上犯了在关系脉络中“我要求你自动自发”的逻辑矛盾¹，但广大教师社群原本已存在的沉默的抗拒性自主意识（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在教育行政命令与政策实施力松散脱落的若干隙缝中，接上了“行动研究”对教师自主社群（知识生产与实践自主）的倡议性召唤；因此，“教改”压力确实促发了台湾

体制内专业工作者对反映实践与叙说探究等典范的学习动能。这也正是舍恩所指明的以培养“反映理性”来长程对抗“科技理性”（schön, 1983, 2007）²的用意。

2007年，保罗·瓦茨拉维克等（Paul Watzlawick）的《改变——问题的解决与形成》与舍恩的《反映的实践者》一书在北京出版，阿吉里斯和舍恩的《实践理论》和《培养反映的实践者》也接续出版。感谢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使得这一系列的书能在两三年问世。在中国与“国际接轨”呼声四起的社会氛围中，我十分关切已被工具理性思维与操作逻辑掌控的人文社会专业教育，是否有可能借力使力地通过对“反映理性”的掌握而由我们自身的在地践行中，接通中国历史内部断裂的人文底蕴，并以行动实验的各种做法承载与转化具有中国政治社会特性的实践知识？

嵌卡于体制内部的实践者

对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工作者而言，这本书有许多章都值得心理与社工界耐心细读：需要耐心是因为教育素有重社会功能调节的专业教育内涵，而主导这些专业训练的逻辑就是工具理性的操作逻辑；更往前推演，大学与研究生们都带着被应试教育模式主导的阅读习性，因而对进入实践者行动路径与思辨脉络的铺陈式描述，常嫌其琐碎而不耐！阅读第1、2、3与10章，可能都会刺激工作者思考自身阅读理解的习性！

对组织发展（好像这一领域还只见树不成林！）与管理界工作者而言，本书亦提供了数章相当丰富的参照实例，第3、4、5、6与7章都是具体实例，而且它们在组织性质与专业领域上，均打破了我们习惯的学界、商业与企业的界线！由合作社利益立基的组织发展到学校组织跨阶层之整合，到组织中个人发展与权威化领导者的形塑问题，这些勾勒与分析应可拓展工作者的视野，然而视野拓展之后的门户界线的跨越与气脉打通，就是我们自己的苦练功夫了！

其实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并不在于它对相关专业领域的参看，而在于它

用了相当的篇章，借不同案例阐明着反映思考、故事叙说、行动科学的细步操作！对已涉猎这些方法的读者而言，相信足以由不同作者的实践案例，澄清若干原本模糊或朦胧的概念！

专业在反映探究中发展

罗伯特·W. 帕特南（Robert W. Putnam）是阿吉里斯最重要的弟子之一，亦是《行动科学》的作者之一。因而，第7章的案例说明，特别有助于对《行动科学》或《第五项修炼》中提及之“左手栏”等概念一知半解的读者，获得一较为清楚的学习图像。“重新框定”、“叙事反映”与“故事”等方法概念（第8、11、12和13章）的实例阐明，像是及时雨似地解答了正在学习这些方法之学习者的重要疑惑！第9章则是唯一有关都市规划专业的案例，但是，它可提供给任何公共政策之行政实施与专业介入历程参考。在中国台湾，政府部门每年花在外包学者之研究案的预算亦十分可观，但却几乎未尊重过政府部门内之行政工作者及具有专业背景之工作者，在系统内进行探究与生产有效知识的能力与权力！长久以来，政府部门内具有丰富专业素养之工作者，几乎一步一步地迈向俗称官僚化的角色僵窄的宿命。我对公共行政涉猎不深，心中的疑问是：公共行政与政策的专业是否缺少了对介入变革知识与方法的掌握，因而就无法创造出政策规范与实施间一个张力对话的辩证力量？至于在研究资源分包中占重量角色的管理学界与业界，前者享受打高空式抽离的利益，后者则易陷入短线功能操作，甚少专业工作者有条件累积能力，发展出持续性催化组织变革的关系！当然，政府部门、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学习转化就只落得或砍手截肢、或易容变形地顾不得对不对得起员工与良知，只管荷包利益了！

希望《反映回观》的出现，亦能对企业经营与管理的伦理道德环境，增加那么一丁点儿的发展性条件！

穿透历史时空的生命探究

“人们害怕知道什么”（第14章）是我初读此书立即被吸引翻阅的一章，因为丹·巴昂（Dan Bar-On）自身被压制之恐惧与仇恨，在访谈同样被仇恨与恐惧压制之对象的过程中，丝丝缕缕地释放到空气中，恐惧与仇恨在被嗅，被接触、被看见后，寻觅到了可依靠的关系（指丹与德国纳粹后代在研究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互助关系）中转化。丹的回观叙说实为一则生命探究的故事。

1990—1991年我在舍恩的协助下写论文的同时初读此书，我的博士论文《中国时报工会抗争成立过程及重要领导者的故事》中的主题正是恐惧——中国台湾历史中的政治恐惧渗透到我们这一代身体中，纠结地经由个体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如同丹故事中世代传承的恐惧与仇恨，在大陆与台湾特定政治历史过程中努力工作的专业工作者是否能在政治烟硝、宣传中辨识与转化潜于其血脉中的恐惧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恐惧的转化并非易事！这也就是叙说反映与故事探究的方法为何在这里是重要的道理！2003年6月陈彦宏在他的论文《樱花的生命实践：因年轻生命的自我探索与实践而看到自己》中，记录了一个家族在政治恐惧中的伤痛与生机，在论文指导的过程中，对隐晦易窜逃的恐惧，由辨识不逃到看见与在恐惧中行动是其论文书写对谈得以突破的轴线！如果任何社会压迫均已实质地挤压摧逼了某个世代与时空的人们，苦难伤痛的通过也必得通过对身体与心灵集体经验的发现与再现而转承前进。《反映回观》最后的这一个故事将生命、社会政治与反映探究合而为一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当它是一份难得的礼物！

本书中文简体版的出版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尤其感谢北京师范大学行动研究读书会的陈江华、刘英莹、张燕、李涛、崔玉晶、赵艳萍、余薇、梁营章，他们对本书做了大量的校译工作。也希望本书能够对中国大陆的实务工作者提供一个前行的反映空间，为他们增添力量。

注 释

1. 《改变——问题形成与解决的原则》一书提到，人类学家贝特森所领导的研究工作归结出一个基本假设——“精神分裂双重捆绑理论”（Double-Bind Theory）。这是一种吊诡在人际关系中的效应。要求别人“自动自发一点！”是其中的一种吊诡类型，这句话所要求的是一种纯粹自动自发的行为，但是因为该行为是在被要求的情况下才做到的，所以也就不可能是自动自发了。采取此方式企图改变别人行为的人，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使自己跟对方同样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参见瓦茨拉维克，威克兰德，等. 2007. 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M]. 夏林清，郑村棋，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 实证主义是 19 世纪发展出来的一强而有力的哲学派别，而科技理性是实证主义的遗产。以科技理性的观点来看，专业实践是问题“解决”的一个过程。操作科技理性作法所带来的后果是：专业知识被阶级化，以“通则”为最高层次，而“具体的问题解决方法”（技术）则位居低的层次，行使由上而下的要求，致使“实践”的处境更加困窘（Schön, 1983）。而阿尔特里希特（Altrichter），波施（Posch）和索梅克（Somekh）在讨论舍恩的实践观点时，整理出舍恩相对于科技理性所提出的另一个“反映理性”（Reflective Rationality）是遵循相反的假设，舍恩认为复杂的实务问题需要特定的解决之道，而非寻找“通则”；专业的工作是依赖于实践者隐含的行动中认识（knowing-in-action），实践者间“关系的动态网络”协助实践者们得以在面对复杂而不确定的状态时采取负责的行动，其协同关系是群体中平行对等的交流而非权力阶级的交易。反映理性支持实践者自发性的成长历程，而不是由外在赋予它或要求它做什么改变（Altrichter, Posch & Somekh, 1993）。参见唐纳德·舍恩. 2007. 反映的实践者 [M]. 夏林清，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Altrichter, Posch & Somekh. 1997. 行动研究方法导论 [M]. 夏林清，译. 台北：远流出版社.

前 言

唐纳德·A. 舍恩

Donald A. Schön

几年前，反映（reflection）与反映性实践（reflective practice）突然成为教育界的时髦名词，其中有些引自我最近的作品（Schön, 1983, 1987），这引发了我一个想法：出版一本有关实践中反映和对实践的反映（reflection in and on practice）的各种案例的书，可能是个好主意——这些案例对这类研究的理论架构和方法论进行阐释，他们既提出了这种研究的关键性议题，也提供了探究作好这种研究之意义的机会。

我邀请了一些人共同投入本书的筹备工作；对我而言，这些人具备进行有关实践研究的实力，代表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取向。共有 17 个人响应我的邀请。去年一整年，他们准备且修正他们的案例，其中大部分人参加了一个为期 3 天的工作坊，对彼此的作品进行讨论与批评。其中某些讨论将会在总论中引述。

作者和他们的案例

本书的 14 个案例可以用好几种方式进行分类，例如，依照作者所选择的实践场境（settings）；他们界定“实践”的方式；对知识和实践议题的关切；对观察、描述以及分析单位的选择；建构案例研究时的特别

感觉。

2 在这些案例中，“学校”是案例最主要的实践场境。班伯格（Bamberger），埃里克森和麦金农（Erickson & MacKinnon），克兰迪宁和康奈利（Clandinin & Connelly），纽伯格（Newberg），拉塞尔和芒比（Russell & Munby）的研究都与中小学有关，其他作者所关注的是更为广泛的行业 and 机构。帕利特（Parlett）是研究英国的听力障碍儿童咨询师；马丁利（Mattingly）研究波士顿教学医院中的职业治疗师；鲍姆（Baum）的案例与公共机构的策划人有关；福里斯特（Forester）探讨城市规划师、房地产开发商和市政官员的互动；赫希霍恩（Hirschhorn）以非营利组织中的管理者和职员为写作对象；格林伍德（Greenwood）研究法格（Fagor）内部的管理者与工人 [法格是西班牙巴斯克郡（Basque）蒙特拉贡（Mondragón）的一个大型工业合作社]；兰扎拉（Lanzara）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式教育的电脑系统的发展；帕特南（Putnam）对他作为一家工业公司的组织发展顾问的长期的指导关系进行了描述；巴昂（Bar-On）则对他与德国的纳粹施暴者子女的访谈进行反映。

从上述可知，这些案例的实践场境横跨了极为多样的范围，它们揭示了实践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不同的观念，以及对“案例”的权限进行设定时采用的不同方式。这些差异性源于研究者不同的背景、兴趣和目的。举例来说，格林伍德、马丁利与帕利特都进行民族志（ethnographic）取向的社会研究。马丁利对教学医院中职业治疗师的研究，帕利特对英国的听力障碍儿童咨询师的研究，以及格林伍德对法格管理者和工人的研究，他们处理的对象都是由个人组成的群体，研究者试图探究这些群体所共同面对的挑战和困境，以及对这些挑战和困境反应的各种知识、策略和看法。马丁利和帕利特的研究分别揭示了众多的专业（包括职业治疗师和咨询师）是如何被他们的机构背景所限制和产生重大影响的。与此相似，格林伍德的研究从合作社文化的发展方面来思考管理者和工人的实践。

兼为心理治疗师和社会心理学家的丹·巴昂对生命实践的最广泛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索。他的研究对象是成人，他们同处普遍性的“文化—

政治—家庭”困境，他们尝试去忍受这种困境，带着摇摆和犹豫。

研究学校的研究者以不同的方式“切入”（即选择、界定和分组）教师、儿童或行政人员的实践。从实践议题的不同关注点来看，他们的切入点是有意义的。

加伦·埃里克森与艾伦·麦金龙这两位科学教师合写的案例，阐述了与3位中学科学教师为期5年的协作经历。此研究聚焦于柯林老师的一堂对3名学生进行有关电池和灯泡知识的教学上，以及柯林老师与实习教师罗茜对这堂课的讨论的对话。同时身兼音乐家、认知心理学家以及教育工作者的珍妮·班伯格，引述了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格雷厄姆（Graham）和帕克斯（Parks）两所小学的教师们为期4年的协作经历，在这期间他们共同发展出一个“制物实验室”（Laboratory for Making Things）——在这个实验环境中老师与学生们接触的是实物——比如齿轮、建筑材料、活动部件等，并且让学生用LOGO语言撰写计算机程序。在实物和计算机、“手工知识”（hand knowledge）和“符号知识”（symbolic knowledge）之间不断来回往复之下，学生们“创建了能够运作的意义性架构”。班伯格的案例探究的是与一组教师的对话，这些对话发生在这些教师进行实验及对这个实验加以反映的时候，而这些实验与学生们在实验室中所做的实验是类似的。在这两个案例中，作者的焦点在于：学生或教师如何真正捕捉到重要的问题并且使这些问题讲得通，以及另外一个人（在第一个案例中为柯林，第二个案例为班伯格）如何协助学生对他们不断演进的实质性知识进行反映。

汤姆·拉塞尔和休·芒比两位主要从事教师教育的教育工作者所举出的案例，以及琼·克兰迪宁与迈克尔·康奈利两位教育哲学家所提出的案例，焦点都放在个体的实务工作者身上——第一个案例中指的是两位教师，第二个案例中指的是一位校长——他们在教室里面或是学校中的行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占据中心的位置。拉塞尔和芒比感兴趣的是：教师怎样才能与时俱进并用新的方式来看待和“重新框定”（re-frame）他们的教学。他们的研究与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类似，帕特南

的研究焦点放在保罗这位组织发展顾问身上，他与帕特南一起工作了数年，以提升他用第二型理论（Model II）进行咨询的实践能力。克兰迪宁与康奈利感兴趣的主要是：费尔（Phil）——多伦多海湾街学校（Bay Street School）的校长——是怎样努力把他对社区学校形象设计付诸实现的。他们的工作是在海湾街学校的一个为期8年的研究课题的一部分，在这个课题中，他们和海湾街学校的教师们合作，共同建构出一种认识自身实践的相互描述的方式。他们追溯费尔实践中知识（knowing-in-practice）的经验性根源，一直追到他早年的经验（小时候、成人的、社区和学校的）。他们的案例与霍威尔·鲍姆对公共机构策划员的研究相似，在这个研究中，鲍姆试图去追溯一个组织生涯的内在发展。

4

约翰·福里斯特和鲍姆一样是一位规划领域的教授，他所研究的对象也是城市规划者，但是他聚焦在一个单一的事件上：规划者、开发商、建筑师和市政官员一起开会讨论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前景。福里斯特通过检查规划者在这个片段中的所作所为，试图揭示规划者的“工作”由哪些部分组成，以及他运用了哪种知识来有效地扮演他的角色。

诺曼·纽伯格，一个拥有社会科技系统理论（sociotechnical systems theory）背景的教育工作者，他以令费城公立学校大为苦恼的高辍学率为研究的起点。他所采用的研究单元是一个学区内的“次级支持系统”（feeder subsystem），他描述了一个多年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他和教师、家长以及行政人员合作，来诊断和阐述辍学问题的成因。

最后是焦万·弗朗西斯科·兰扎拉，他选择自我研究（self-study）为分析单元。在自我研究中，他和班伯格（Bamberger），一位电脑程序设计员以及麻省理工学院音乐部的职员合作了数年，追溯音乐 LOGO 的发展和传播，音乐 LOGO 是对音乐理解实验施加控制和反映的一种计算机环境。身兼系统分析师和社会研究者的兰扎拉，专注于探讨研究者的哲学困境——面对自身和参与者的多元而且变动的事实，研究者却被要求告知所发生事情的唯一的真实性。

这些划分实践的方式与案例作者所关切的议题和理论架构是如此紧密

相连。他们对现象和理论口味不一。在案例中，他们并不对理论架构进行检验，反而运用这些理论架构来生产更为明确的、更具地方性的假设。举例来说，在赫希霍恩的案例中，其理论架构就是精神分析理论“客体关系”（object relations）的变形。鲍姆的案例则运用了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有关个人认同的发展理论。对巴昂而言，关键性的观念在于“走出”（working-through）这个概念——在他的案例中，受访者挣扎着“走出”早年威胁性的、有时甚至是恐怖的经历。格林伍德则集中于文化的观念，或更具体地，是集中在蒙特拉贡工业合作社的文化中诸如民主、平等、参与等关键概念之间的关系。纽伯格用系统理论来观照他的学校参与行动研究。马丁利、克兰迪宁和康奈利则从当代叙事（contemporary narrative）、叙事推理（narrative reasoning）和解释分析（hermeneutic analysis）理论来观照他们的工作。

本书中每个案例都阐述了下述两者之间的紧密连接：一边是作者所选择的理论架构、偏爱的现象和知识——他们视为要对之进行反映的、具有核心重要意义的事物以及他们的关系；另一边则是他们采用的反映性活动的模式。这些理论、现象和反映性活动的集合能帮助我们设定每个案例的先决条件，他们决定了一个好的实践研究的意义。

5

反映回观

正如前文所述，这些案例之间差异十分明显，以至于读者会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些案例放在同一本书中。

我的答案是，虽然作者们有着极为不同的理论架构和对实践的不同定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关键性视角：他们都采用了“反映回观”。如果把珍妮·班伯格和德利诺·杜克沃思（Dleanor Duckworth）的话（Bamberger & Duckworth, 1982）通俗一点，我可以这么说——他们都在试图“为实务工作者给出理由”：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方式，通过对从实践（这些实践由各种自动自发的活动的模式所组成）中揭示出来的知识的探究，对实务工作者实际所说的、所做的事情进行观察、描述和说

明。每当这些模式看似怪异或令人困惑时，这些作者就假定有一个潜藏的意义有待揭示——而这是研究者的本分。结果是，这些作者有时被引向对有关研究对象的知识的理解作反映；为了揭示他人实践的意义，他们先要对自己的实践提出问题。

这些案例的作者坚决不做的是，把实践只当作一种应用领域。他们并未将实务工作者的决策列于研究本位的理论或模式之下——譬如决策理论（decision theory）或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当他们把一个明确的理论架构用于研究时，它被用来指导观察、描述或分析：什么是实务工作者已经知道的？他们怎样在自己的实践脉络中进行学习？

如同我在《培养反映的实践者》（*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1987）中所说，“反映回观”是一场革命，它开启了建构实践的认识论问题之门。实务工作者需要知道什么？对内在于技术活动中的日常实践知识的反映，“反映回观”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使当作者希望协助实务工作者获得一套新技术或一种洞察力的时候（在珍妮·班伯格的案例中，研究者帮助教师学会用新的方式与学生、计算机、教材一起工作；在罗伯特·帕特南的案例中，研究者协助组织发展的专业人员学会运用行动的“第二型理论”），他们最关心的仍然是探索并帮助实务工作者明白——什么是他们已经知道的，和什么是他们已经知道怎么去做的。

6

另一方面，强调下述情况也很重要：我们这些案例的作者，正如他们在实践中对不同切入点、不同的分析单元和不同的划界方式的采用，取决于他们不同的关注议题，他们对多样的反映活动给出了不同的理由。“反映回观”不需要统一的反映方法；不仅如此，采用“反映回观”的研究者反而会觉得有义务彼此互相给出理由。正如其中一个作者所说：“我们的讨论不想把一个（人的）观点约等于另一个。……我们能够互相了解、互相批判而且改善彼此的工作，但我们仍然能够走自己的路。”

从这个方面来看，或许这些研究主要是程度上的差异——研究者离他们的研究对象有多远？研究者坚持做一个观察者或是访谈者吗？或者反过来，研究者试图邀请他们的研究对象成为协同探究者吗？在这个连续体